

从罢工领袖到全国总工会主席

——试论陈云对中国工人运动的贡献

姚 力

1948年8月1日至22日，第六次全国劳动大会在哈尔滨召开，本次大会距离第五次全国劳动大会已经过去了19个年头，是中国工人运动史上规模空前的一次盛会。会议恢复了中华全国总工会并重新选举了领导机构。10月10日，在执委会首次全体会议上陈云当选为中华全国总工会主席。在人民解放战争取得节节胜利，工人阶级即将肩负起新中国领导者的艰巨使命时，陈云能够承此重任，并非历史偶然。

一、由领导工人运动走上革命道路

1925年上海工人运动风起云涌，五卅运动后，中共中央决定将上海的总罢工转向局部的经济斗争，并把商务印书馆作为党发动罢工的重点之一。此时陈云刚学徒期满，转到商务印书馆发行所上海虹口书店做店员。在革命风暴和共产主义思想的影响下，他积极投入罢工运动，组织商务印书馆发行所职工成立职工会，并被推选为委员长。从1925年8月到年底他两次参加并领导了商务印书馆工人罢工斗争。由于组织周密，加上商务印书馆革命基础好，两次罢工均取得了胜利，使党领导的上海工人运动有了新发展。这期间，陈云在积极参加领导职工运动的同时，多次进入党内举办的流动训练班，潜心阅读马列经典著作，思想觉悟和理论水平都有很大提高，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后来他在回忆自己入党经过时写道：“入党动机显然由于罢工运动和阶级斗争之影响。”^[1]商务印书馆的罢工斗争开启了陈云的工人运动生涯，使他初次接受了血与火的革命洗礼和锻炼。

在罢工斗争中，陈云善于思考的天性和富于组织的才能，使他很快脱颖而出，成为罢工运动的领袖。他不仅在行动上走在斗争的最前列，而且在思想认识上高人一筹，因此，在工人群众中树立了很高威信。《职工》是商务印书馆发行所职工会创办的地下刊物，在广大职工中有很强的影响力。陈云利用这份刊物连续发表多篇文章，宣传革命思想，指导工人运动的开展。1925年11月在创刊号上他发表了《总工会是什么》和《职工在现社会的地位》两篇文章。在第一篇文章中他指出：总工会代表工人的利益，是与帝国主义对峙的，国内资产阶级一方面想借工人这支生力军对抗帝国主义，一方面又害怕工人势力太大。因此，工人运动处处受摧残。但其势力只有日日增加，是不会被消灭的。在第二篇文章中他提出：工人阶级成为领导群众向帝国主义不折不扣进攻的民族革命先锋队，它有两大责任：一是联络各阶级进行民族革命，二是解放自己。^[2]陈云对革命形势的分析、对工人运动的意义和工会组织的定性，都相当准确。1926年1月《职工》专门出了《罢工专号》，陈云又发表了两篇文章，一篇题为《罢工后职工应有的觉悟》；另一篇题为《我们为什么要罢工？》。两篇文章深刻总结了商务印书馆职工罢工的经验教训，阐述了工人斗争的合理性，提醒工人阶级不要受资本家和工贼的拉拢，要团结在职工会的指挥下，谋求工人阶级的利益。此后，他还先后在《职工》上发表《职工与革命》《中国民族运动之过去与将来》《和平之路》《自治与民众》等文章，启迪工人群众的思想，鼓动他们的革命热情，对不断掀起的革命浪潮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陈云的出色表现受到了党组织的重视，为此上海总工会委派他领导上海店员罢工斗争，参与筹组店员总工会。

1926年10月到1927年3月，为配合北伐军的行动，上海工人开展了声势浩大的全市总罢工和武装起义。在中央特别委员会的指挥下，陈云积极组织商务印书馆、南京路商铺的职工参加罢工、罢市，陪同周恩来、赵世炎多次考察商务印书馆的地形，召集工会骨干分子开会，商讨行动方案。在第三次起义战斗的关键时刻，他受上海总工会的派遣，与驻扎在龙华的北伐军东路军谈判，要求他们速进上海。尽管陈云没有直接参加武装斗争，但他服从组织安排，在工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上海工人武装起义的成功是中国工人运动史上的壮举，一批如陈云一样的工人党员由此成长起来，成为中国革命的中流砥柱。

二、边纠“左”边推进总工会工作

1932年3月14日，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陈云任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兼任全国总工会党团书记。此时，由于受“左”倾冒险主义和关门主义的干扰，党的白区工会工作损失严重，到1932年1月，全国赤色工会的会员只剩下三千人。陈云临危受命，工作任务异常艰巨。

他从最紧迫的沪西工人罢工着手，深入到工人群众中间，了解他们的生活和思想状况，仔细研究斗争方式和手段。在沪西工人罢工失败后，他深刻分析斗争失败的原因和教训。此后他组织领导了南洋烟草公司罢工、时事新报馆罢工，以及失业工人斗争等工人运动。尽管这时陈云在总体上还受着临时中央“左”倾错误的束缚，但由于他注重实际，深入群众，讲究斗争策略，因此在具体工作中仍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上海在这一时期先后爆发的十六个规模较大的工人斗争中，全总参加领导了十二个。据上海党史资料记载：自三至七月，党员增加一倍，团员增加一倍，工联会员和赤色互济会员各增加四倍。”^[4]伴随工人运动的高涨势头，全总的工作面逐步打开，突破上海、江苏，开始关注全国工人运动的开展。在陈云主持下全总党团会议多次研究全国各地的工会工作，他还对东北、山东等地的工人运动提出了具体指导意见。在这一阶段，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决定将职工部人员并入全总，它的任务也由全总负责，这使陈云肩上的担子更重了。1932年“七月底八月初，在短短二十天内，他一连撰写了十多篇报告和文章，计三万多字，详细记述了三月中旬以来全总领导的几次大的斗争，总结其中的成绩、经验和教训，成为陈云早年工作中写作的一个高峰期”。^[5]他提出赤色工会不能脱离工人群众，必须从工厂的实际情况出发来开展工作；黄色工会与国民党工会是有不同的，在黄色工会内领导群众斗争，正确运用下层统一战线等。这些思想摒弃了“左”倾错误的影响，对工人运动的指导作用是十分积极和有效的，表现出他正处在“努力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逐步变化过程中”。^[6]对这一时期的工作，陈云曾回忆说：“在这个时期中我自认是在白色区域中工作上最有兴趣的一个时期。工会工作获得了成绩，我亲自参加了许多罢工和黄色工会工作，个人的获益，实在不小。”^[7]革命斗争实践的加深，使陈云对工会工作积累了较多经验，政治上也更加成熟，具备了独立主持中央某一领域工作的能力，为他接手全新的中央苏

区工会工作准备了比较充足的条件。

1933年，陈云随临时中央机关迁到中央苏区。1月下旬，博古主持召开中央会议，决定中共临时中央同苏区中央局合并，仍称苏区中央局，陈云为成员、常委；中华全国总工会同全总苏区执行局合并，改称全总苏区中央执行局，陈云继续担任全总党团书记。工作安排一下来，陈云立即全身心投入到苏区工会工作中。他首先对苏区工人运动状况开展了深入细致的调研，当发现存在的脱离实际、“左”倾错误等问题时，及时给予纠正，既保障了苏区经济生产的平稳发展，也维护了工人的合理斗争权益。^[8]与此同时他积极支持组建行业工会，苏区先后组建了中国农业工人工会、中国店员手工艺工人工会、中国纸业工人工会、中国苦力运输工人工会等工会组织，极大地发展和壮大了革命力量。围绕着苏区军事斗争任务，陈云积极参加扩红工作，支持工会会员组建工人师，为反围剿、保护苏区做出了重要贡献。这期间，他先后在中共苏区中央局机关报《斗争》、全总中央执行局机关报《苏区工人》等报刊上，撰写了多篇指导工会工作的文章。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三篇收入了《陈云文选》。《苏区工人的经济斗争》发表于1933年4月25日，文章在批评苏区党和工会内存在的忽视工人经济斗争，忽视改善工人生活的右的错误倾向后，着重分析了在领导工人经济斗争中存在着的“左”的错误倾向，指出这种倾向只看到行业的狭小的经济利益，妨碍了发展苏区经济、巩固苏维埃政权的根本利益。因此，纠正这两种错误倾向，正确领导工人的经济斗争，是目前的中心任务。^[9]另外两篇均发表在7月15日，一篇题为《怎样订立劳动合同》，另一篇题为《这个巡视员的领导方式好不好？》。两篇文章对工会工作中极为关键的订立劳动合同和干部工作方法问题，提出了中肯有效的指导意见。通过这三篇文章我们不仅可以管窥陈云在中央苏区工会的紧张工作和突出成绩，而且可以看到他在解决具体问题过程中表现出的实事求是、善于抓住问题要害、迎难而上的能力和作风，从而进一步理解了他能够完成好党交给的各项工作的思想基础和力量源泉。

三、向工人阶级发出建立新中国的总动员

随着解放战争转入战略进攻，接收并管理好城市的任务成为党的工作中的当务之急。为此，加强对工会组织的统一领导，利用工会发挥工人阶级在经济生产、社会管理中的作用，显得尤为关键。1948年3月5日，中共中央工作委

员会发出《关于召开全国各解放区工会代表大会给各地的指示》。此后不久，由于国统区工会组织的积极响应，中央决定将会议提升为全国性的工人阶级代表会议，并延迟会期，以便国统区工会组织的代表能够如期参会。

中共中央对大会寄予很高期望，并指定由东北局承担会议的筹备工作。4月28、29日，中共中央召开了赴哈尔滨出席第六次全国劳动大会的职工代表各区主要负责人会议，周恩来、刘少奇、朱德先后在会上讲话，对即将召开的职工代表大会的重要意义，以及要讨论的主要议题给予指示。紧接着在1948年“五一”节口号中明确提出“解放区和蒋管区的职工联合起来，建立全国人民的统一组织，为全国工人阶级的解放而斗争”。^[10]职工代表大会筹备工作紧锣密鼓地展开，确定全国总工会最高领导者的人选问题也被提上日程。鉴于全国总工会的性质和全国解放在即的形势，此人不仅要在共产党内具有很高威望，而且要具有领导工人运动的经验，被广大工人群众普遍认可。

1948年5月12日，就“我党内定何人主持全总”工作等问题，东北局向中共中央发出请示。14日，周恩来为中共中央起草致东北局电，答复说：关于全总执委人选问题，我们拟以陈云担任主席，李立三、朱学范担任副主席，刘宁一担任秘书长或副主席。同时他还就陈云未来的安排问题指出：“陈云同志主要工作目前应主持东北的，在将来则是全国的工业建设，同时担任全总主席，可使新民主国家的工业与工运更好地结合起来。全总实际工作可由立三、宁一两同志与朱学范合作。”^[11]可见，当时中共中央对陈云担任全国总工会主席，考虑得很全面、很长远，还考虑到了未来国家工业化建设的需要。6月4日，周恩来再次电告东北局：陈云现在有兼任全国总工会主席的必要。待中央政府成立，他的工作更加繁忙时可以考虑不兼。^[12]此时，随着新接收城市工作的增加，陈云最关心的是经济生产和人民生活的恢复与发展，注意力主要放在了加紧解决东北财政经济严重困难等问题上。但是，作为一贯听从组织安排，敢于承担重任的共产党员，陈云接受了总工会主席的重担，并参与了会议的筹备及相关工作。

8月3日和4日，陈云在大会上作了题为《当前中国职工运动的总任务》的报告，提出当前中国职工运动的总任务“就是彻底推翻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国民党反动派在中国的统治，建立新民主主义的人民共和国。讲得普通一点，就是打倒国民党反动派，打倒反革命的旧政府，建立革命的新政府。这是现阶段中国工人阶级最高的任务，解放区的工人和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人都要为此而

奋斗”。^[13]陈云强调，凡是有关工人切身利益的一切问题，我们都要关心，都要帮助解决。但是，如果不完成我们的总任务，要彻底解决这些问题是不可能的，即使是部分地解决了，也是不能持久的。接着，他在梳理二十几年来国民党对革命、对工人阶级的残害后，进一步说明推翻国民党统治是当前职工运动的首要任务，并分别对国民党统治区和解放区的职工运动提出了不同的任务要求。^[14]报告对形势的分析十分透彻，说理清晰、有力，极易被工人阶级理解和接受，准确、具体地传达了中共中央对工人运动的新方针、新策略和新要求，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为了作好这个报告，陈云自己写好提纲，并作了反复修改。从中我们不仅看到了一个已经成长为党的优秀领导者的陈云，也看到了一个始终保持工人阶级本色和情感的陈云。

四、留给后人的精神财富

考察陈云在中国工人运动史上不平凡的经历和突出的历史贡献，不仅是为了铭记历史，更是为了学习和传承老革命家的道德风范、思想观点和工作方法，这些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习得一二便可受益终身。

其一，做远大理想的践行者才能凸显人生的意义和价值。陈云家境贫苦，能在商务印书馆学徒成为店员，机会难得，生活条件也有所改善，而且因为他勤恳、上进、好学，发行所比较看中他，提升、晋职的前景可观。但是，他关心民族和国家前途，对受苦受难的工人阶级深切同情。在罢工运动中，他接受了革命斗争的锻炼和共产主义思想的启迪，确立了改造社会，为建立平等、美好的社会而奋斗的远大理想。他说：“我自觉入党时经过考虑，而且入党以后，自己觉得此身已非昔比，今后不是做成家立业的一套，而是要干革命。这个人生观的改革，对我以后有极大的帮助。”^[15]为了理想，他抛弃个人利益，义无反顾地坚定走下去。“当我在参加革命后，资本家威胁我时，我想到吃饭问题会发生危害，但立即又想到：怕什么？手足健全的人到处去得，可以到黄埔军校，可以卖大饼油条，只要立志革命，不怕没饭吃，归根结底，只有推翻现在社会制度以后，才大家有饭吃。”^[16]在困难重重、险象环生的工人运动中，陈云不改初衷、百折不挠，从一名店员成长为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家，这是革命洪流的推动，更是革命理论和坚定的理想信念的支撑。

其二，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是正确决策的保证。20世纪30年代初，

“左”倾路线在党内占据上风，在工人运动中过多地强调革命斗争忽视工人群众的经济利益和生活需要，致使在白色恐怖下革命遭受严重损失。陈云在这样的条件下领导总工会的工作，困难异常严峻。他坚持从实际出发，关心广大职工的切身利益和实际生活。因此，在具体措施上比较灵活，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左”倾错误的影响。在中央苏区，他身体力行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及时发现工会工作中漠视群众利益的右倾问题，修正《劳动法》中脱离实际的条款，纠正“左”倾错误，提出工会工作要“从工人最高兴的工作做起”，“提出群众迫切要求解决的问题”^[17]的重要观点，力主为职工解决实际困难、办好事，成为职工信得过的干部。新中国建立后，陈云在领导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历史关头，始终把保障人民生活作为决策的出发点。因此，在中国共产党的高级干部中，陈云一贯以稳健而著称，他的正确决策是与坚持实事求是和群众路线紧密相关的。

其三，服从党和国家的需要是共产党人的优秀品质。1948年年初，陈云在完成坚守南满的任务回到哈尔滨时，身体状况很不好，正如他自己所形容的如一辆“木炭车”。此时全国解放的步伐势如破竹，如何接收、管理好大城市的问题急需陈云去回答。因此，他对中央安排他担任全国总工会主席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从《陈云年谱》中我们可以看到，陈云曾提出只做“名义上的主席”或建议由“其他同志作候选人”或请中央“再考虑”。^[18]然而，中共中央没有改变这一决定，陈云便欣然接受了这副重担。正如他在给中央的电文中所说：“如认为仍照原示不改为好，则完全服从。”^[19]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听从党的安排、能为人民多做事，是他面临个人、集体、国家利益时第一位的选择。刘英曾回忆，在长征中间，陈云是政治局委员，中央没有具体分工他管哪方面的工作，是一个机动干部，哪里需要人，中央就派他到哪里去。毛主席等中央纵队的领导认为他有能力，善于指挥，部队也信服他。^[20]这一次陈云在全国总工会主席的岗位上，同样很好地发挥了作用，没有辜负组织的信任和重托。

陈云以出色地领导工人革命斗争而名垂中国工人运动史册，他对工人运动、工会组织、工人阶级的深刻认识和行之有效的的工作方法，对于当前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巩固工人阶级地位、发挥先锋模范作用，仍具有借鉴意义。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

注 释:

[1][2][15][16][18][19]《陈云年谱》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25页,第27页,第25页,第26页,第511、513、520页,第520页。

[3]胡绳:《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央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133页。

[4][5][6][7][11]《陈云传》(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122页,第125页,第129页,第129—130页,第538页。

[8]熊亮华:《陈云调查研究的重要实践及其启示》,《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个人课题成果集2012年》(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556—558页。

[9][13][14][17]《陈云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8—12页,第361页,第365—368页,第23页。

[10]《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25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284页。

[12]《周恩来年谱(1889—1949)》下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791页。

[20]刘英:《我所知道的陈云》,《党的文献》1996年第2期。